

从《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到《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好莱坞“漫威”十年布局背后是什么

赵宜

作为“漫威”影业十年布局的阶段高潮，《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以下简称《复联3》）全球开画以来，以超16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暂列影史第四位。目前横亘在其之前的，还有《阿凡达》《泰坦尼克号》和《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以下简称《星战7》）等“20亿俱乐部”成员，《复联3》加入这

一阵营也指日可待。

事实上在电影上映之前，《复联3》就早已吸引了全球影迷的持续关注，其首支预告片在24小时内获得了2.3亿的浏览量，创下单部预告片浏览量纪录。可以说，该片及其所连接的“漫威”电影宇宙都呈现出了可怕的全

“漫威”电影宇宙所建立的文化景观，将好莱坞的全球化野心推向另一个高度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20亿俱乐部”成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它们都同“新好莱坞”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阿凡达》与《泰坦尼克号》的导演都是詹姆斯·卡梅隆；斯皮尔伯格担任了《侏罗纪世界》的制片，而这部电影是其上世纪90年代《侏罗纪公园》系列的重启之作；《星战7》则由卢卡斯影业出品，是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系列的全新续作。

肇始于1960年代后期的“新好莱坞”运动是美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电影革新运动，这其中，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与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直接改变了电影行业的游戏规则。1981年，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合作的《夺宝奇兵》花费了20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而到了1991年，卡梅隆的《终结者2：审判日》的制作成本已经突破了一亿美元。这三位联手缔造了好莱坞“大片”时代的电影人，至今依旧以各种方式盘踞着影史票房高位。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正值经济全球化时期，传统好莱坞经由一系列垂直并购和功能重组实施向海外市

场扩展的全球化战略，继而好莱坞大片的出现几乎奠定了此后30年间全球文化生产格局与好莱坞的全球领先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漫威”电影宇宙所建立的文化景观正将好莱坞的全球化野心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并逐渐替代了1980年代以来的大片策略。

所谓“漫威”电影宇宙，指的是“漫威”影业基于“漫威”漫画出版物中的角色而制作的系列电影。然而，《复联3》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不能将其当作一部独立的电影来观察，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续集系列。从2008年的《钢铁侠》至今，这一角色相互勾连、故事相互嵌套、叙事相互推进的产品体系已经生产了19部电影，获得了总计超150亿的全球总票房，并仍在稳步推进其后续作品的开发。4月30日，“星球大战”官方社交网络账号发布了一张蕾伊（《星战7》的主角）将一柄“光剑”交给钢铁侠的漫画，以此祝贺《复联3》打破《星战7》创下的北美影史开画票房纪录。而这一交接棒的明喻，也再次强调了好莱坞从上世纪的大片传统向新策略的转向。

“漫威”的扩张策略，隐蔽地将观众的消费过程从电影院向互联网迁移

好莱坞大片策略最初是为了应对电视媒介的冲击，并在短暂而无效的对抗后，通过一系列纵向兼并与横向重组，由此形成了横跨多种媒体的跨媒介生产体系。这一生产方式在30年间成为好莱坞向外输出的稳定模式。不过，随着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技术在全球普及，大片模式开始受到考验。

好莱坞大片模式的运作主要基于大众传播效果，互联网的出现则迅速消解了其固有的地位，尤其是获得了信息传播与选择的主动地位的消费者如今愈发难以被锁定。因而，“漫威”电影宇宙对大片模式的挑战，不是两个好莱坞之间的较量，而是其应对新一轮媒介革命的自我更新。

2008年的《钢铁侠》及其续作成为这一模式的开始。《钢铁侠》系列看似只是传统的续集电影，但在两部电影的片尾“彩蛋”中，都展现了某些与电影主线叙事无关（“神盾局”特工与雷神索尔）的线索。在“漫威”电影宇宙的建构中，这些“彩蛋”成为主动与消费者展开沟通的关键中介。果然，经不住诱惑的消费者试图在通常不超过10秒的片尾视频中搜寻信息，并像带着“家庭作业”的孩童一样将这一活动带出了影院：他们在属于私人的时间里努力将“彩蛋”与电影官方发布的新闻、主创人员在社交媒体中流出的只言片语乃至来源不明

的谣言相联系，试图将这些媒介碎片拼凑成有用的文本。

正是以消费者作为纽带，“漫威”影业顺利地两个情节上独立，但故事内部相互勾连的系列电影——《钢铁侠》和《雷神》连接起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漫威”将旗下多名主要角色拍成系列电影的同时，在2012年推出了一部多个主角共聚一堂的超级电影《复仇者联盟》。时至今日，“家庭作业”越来越多，他们也完成了第三部续集，并史无前例地将67名主要角色容纳在一部电影当中。在这个空间拓展和人口激增的过程中，不同主角、不同故事的世界之间相互勾连、互为“彩蛋”，而观众需要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庞杂，留给他们的“家庭作业”越来越多，而他们也越来越沉迷于这个媒介生产者创造的游戏当中。观众在互联网空间中相互交换信息，同半推半就的出品方进行模棱两可的交流，仔细地辨认每一块媒介碎片。在这个过程中，“漫威”隐蔽地完成了将观众的消费过程从电影院向互联网迁移的“壮举”；事实上，早在电影上映前的半年时间，当观众第一次在社交网络上为《复联3》的首支预告片疯狂点击与讨论，并陷入与官方之间的“剧透”非正义之时，《复联3》的票房成绩就早已失去了悬念。

当消费者彻底陷入“漫威”的生产循环中，逐渐丧失的是平视文本的对话视角

于是，消费者在自觉建构的巨型文本空间中越陷越深，彻底陷入了“漫威”生产循环当中，被引诱为特定文本的专属粉丝，忙于低头捡拾被精心洒落的媒介碎片，并将得来的意义还送给媒介生产者，也由此成为心甘情愿地寻找、组织和传播符号资源的数字劳工，成为远比大片模式下的消费者更主动、高效和忠诚的帮佣。

最危险的地方还不在于粉丝们陷入了这一数字时代的全新剥削关系当中，而是在他们忙于低头捡拾的过程中，轻易地丧失了平视文本的对话视角。“漫威”电影宇宙特殊的运作方式，导致了每一部影片都失去了其“完整”的意义，而成为仍在膨胀中的宇宙中的一个片段。即便是号称“十年布局、终极一役”的《复联3》，也没有兑现其“终极”之承诺，而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粉丝们陷入了更深的焦虑：谁真的死了？谁会复活？《复联4》将会如何收场？就像影片的片名所暗示的一样，这场“无限战争”将没有尽头，消费者由此被拖入了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等关系当中。

在新策略不断奏效的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好莱坞式价值观输出从未停止。事实上，从“漫威”电影宇宙的第三阶段开始，被包装在传统超级英雄拯救地球的叙事模式下的“漫威”电影开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话语。第三阶段的开篇之作《美国队长3：内战》的

剧情被表述为一场有关美国的政治辩论，随后，这场辩论被延续到了《黑豹》之中，但值得注意的，《黑豹》中被塑造为反派的克尔芒戈与他所代表的解放被压迫者的愿望没有被纳入辩论的议程之中，而是随着其“谋权篡位”的戏剧行为而被自动划归为了非正义的。而克尔芒戈的出发点，那个真实且正在发生着不平等与压迫的世界，则被一个想象中的非洲发达国家的宏伟景观轻易地遮蔽了。

因而，“漫威”电影所遵循的，事实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主动地排斥着美式主流价值观念可之外的任何假设。这一逻辑被拆解并嵌套在相互联系、不断膨胀的电影宇宙当中，使个体失去了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力量，并将这种价值观念建构为了真理性的“正义”，传递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漫威”电影宇宙第一个十年的落幕和下一个十年的开启，这一进程不仅在纵向覆盖更多代际，进而使这一套逻辑开始发挥出其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交互作用。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复联3》打破《星战7》创下的北美影史开画票房纪录，再次喻示了好莱坞从上世纪的大片传统向新策略的转向。



重访经典

《山海经》序跋揭示的意义

历代学者注释传播《山海经》的持续热情源于对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的信念

詹丹

《山海经》是巫术之书？地理学之书？还是志怪小说？对其加以目录学归类，历来就够乱的。但打开该书，扑面而来千奇百怪的直觉，却是很多人都有同感的。以致到今天，百姓日常话语中，“山海经”仍是“奇闻异事”的代名词。

在古代，阅读这种“奇闻异事”究竟有什么意义，则是《山海经》流传过程中，各种相关序跋的讨论话题。其结论概括来说，就是阅读《山海经》有助于提高君子修养。

阅读《山海经》的真正意义，在于能让人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许多闻所未闻的怪异之物

据现有记录，《山海经》最早整理者刘歆，在《上〈山海经〉奏》中，把阅读《山海经》的基本价值定位在了解“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的风物上。他还通过举当时博学大儒东方朔和刘向为例，说明他们因为熟悉《山海经》，很好解决了进献的“异鸟”喂养问题，也解释了人们对地下罕见文物的疑问，从而提出“博物君子”的修养命题。

晋代郭璞的《山海经注》，开启了后世注《山海经》的传统，为世人接近、理解《山海经》，架设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但他为《山海经注》写的一篇“序”，主要不是在阐发他注释的体例和价值，而是讨论如何看待《山海经》“怪异”的问题。在这篇“序”开头，他就把这一“怪异”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

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闲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



《山海经》中的九尾狐。刘力文绘制

那他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呢？

在他看来，物品本身无所谓“怪异”和“不怪异”。“怪异”或“不怪异”的判断，其实都是由人自身的意识决定的。用郭璞的话来说，就是“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但是在这里，他把判断“异”的标准从客观世界移到主观内部，不是为了强调“物”是相对的，而“我”反倒是绝对的，其实，郭璞的真正用意，是要把“我”的绝对性也一并取消。因为，当郭璞在解释人何以会得出“异”或者“不异”的主观判断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理由，就是人人都必然受生活习惯所制约，是人自身见闻的局限才导致对事物“奇异”性的判断。用他的话说，“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所蔽”。

这样，世人阅读《山海经》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变成具有博物学修养的君子，而是当我们打开《山海经》的同时，也把一个陌生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打开在我们面前，由此对照出自己知识的欠缺和见闻的孤陋，也才有可能让人们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许多不可理解的、闻所未闻的怪异之物。这样，郭璞在他的“序”中，特意把刘歆的奏书中提到的“博物”修养前冠以“达观”一词，构成“达观博物”的特定组合，成为赋予君子修养的又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

既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学子何以读《山海经》？

但是，在儒家文化观念逐渐深入读书人内心时，强调阅读《山海经》

可以获得博物学修养或者达观的心态，就必然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语怪”之书，其实是与儒家经典《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互相矛盾的，更何况《庄子》中也有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点。

梳理明清时代《山海经》各种注释本的序跋，可以发现，文人学者消除这种矛盾，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

其一是如明代的杨慎、刘大昌等，在他们有关《山海经》注本的序跋中，相继正面讨论了这个矛盾。特别是杨慎的跋，是从记录朋友间的一段具有冲突的阅读经历开始的。

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与亳州薛君宗时在诵读《文选》《山海经》时，在旁的一位同僚非议道，对这样的书是没空读的，如有时间，还不如直接读儒家的《六经》。薛君宗反驳说，要等有时间才读，只怕连读《六经》的时间也不会有。但杨慎、张愈光等人顺势接过这个话头，用食物的比喻探究了儒家《六经》和《文选》《山海经》两类书的关系，并以他们特有的思路，回答了圣人对《山海经》这一类书“不语不论”的真含义。在他们看来，《六经》是五谷，《文选》《山海经》是山珍海味，日常生活固然需要实用的五谷，但一味拒绝山珍海味，也未必恰当。问题是，正因为《文选》《山海经》是山珍海味，消化起来不容易，所以一旦进入阅读状态，就要下大功夫，这样，圣人所谓的不读不语，其实就是不轻易读不轻易语，这正是圣人作为人谨慎的地方。

这里，用两类不同的饮食作类比，把《六经》与《文选》《山海经》的关系放在日常与非日常的层面来思考，使得《六经》和《文选》《山海经》的关系不再对立起来，更具一种互补性。但这种互补，又不是在同一个层级的互补。它既有日常与非日常的差别，也有着容易消化和不易消化的差异。所以，在《六经》没有读通前，在对《文选》《山海经》没有时间下大功夫前，干脆暂时不读，以免浅尝辄止地自欺欺人，这样的观点其实还是有相当道理的，这样的坦诚严谨态度，也正是君子修养所应具备的。后来，刘大昌的《刻山海经补序》也是继续这一意思，强调圣人的不议不论，其实就是出于一种谨慎对待。只有对圣人的“不论”内涵加以仔细辨析，道出内在的曲折，而不是走极端，才能不致使自己陷入孤陋寡闻的泥坑。

相反，如果以《山海经》表面的“诡幻怪”来简单等同于“子不语怪力乱神”，恰恰显示了自身的浅陋。其二是清代的吴任臣、毕沅、孙星衍和郝懿行等，他们在《山海经》注释本的各种序跋中，基本上否认《山海经》的“语怪”性，大多强调了其“质明有信”、强调其“非语怪”“未尝言怪”。不过，他们的否认，是把其中的

从2008年的《钢铁侠》至今，“漫威电影宇宙”已经生产了19部系列电影，获得了超150亿的全球总票房。左图及上图均为《复仇者联盟3》剧照。



内容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来解释的。如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序》，就有这种开阔的地理学视野，他说：“抑闻之九州之外，复有九州，斯经所具，特亚细亚一隅耳。若乃纪葱岭之西，夸印度之北，占西海孔雀之星，侈南极大浪之异。抵掌而谭，纵横四表，则瑰奇吊诡，将更有超于耳目寻常之际者。余则有志未遑矣。”

而阮元在给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作序时，一方面，他固然提出“是经为山川舆地有功世道之书，非语怪也”；另一方面，他引入历史学的维度，进一步提出，“上古地天尚通，人神相杂，山泽未烈，非此书未由知之”。这样，其对不语怪的强调，就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把神话学的因素，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接纳了下来。

总之，《山海经》作为包含了较多神话内容的上古著作，其中的“经”，本来可能只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界限”，也是“山经”“海经”本来的意义。至于其中掺杂了较多的怪异之象和神奇的事件，这既是附着于地域的传说延伸，也跟巫术有一定关系。但是，当后世学者纷纷加以注释和传播时，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渐渐获得了它的经典地位，就像章学诚在论到《六经》的“经解”时说的，一些本来不是经典的，是因为有了后人的传注，才抬高了经、确立了经。“界限”意义上的“经”，也就变成了“经典”，但我们从留下的各种序跋中可以说，引发历代主流学者注释、传播《山海经》的持续热情，主要原因是对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因为认定其为虚幻性的志怪小说。也因为相信这是未知的真实世界才有的怪异，才说明了其对达观博物、真诚严谨的君子修养的重要性。

虽然从研究小说的立场看，我们会遗憾古代注释者持有的一种立场，认为他们没能依据其中的神话元素而获得一种神话学或者小说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但换一种角度看，这样的理论不自觉，反而更具历史真实性，更引发人的思考。套用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断语，我们也可以说过往的一切皆是历史，正可以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研究，它与自觉或不自觉的小说学、神话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相辅而成。而这样的历史态度，或许就是君子修养的优秀传统。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序跋整体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3BZW102）